

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认知〔*〕

——以《星期评论》为中心的研究

杨宏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之一。从该刊发表的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国民党人对俄国的革命和新政权抱着一种同情和肯定的态度。《星期评论》分析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正义性与历史功绩。该刊高度赞颂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褒扬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有利于中国民众认同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为国民党走向联俄、联共的改组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星期评论》;十月革命;苏俄政权;联俄联共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19

十月革命是影响人类 20 世纪历史的大事变。它不仅改写了俄国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尤其深刻地影响了那些与俄国接壤的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俄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正在探索中国革命之路的国民党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利用手中的大众传媒,如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闽星》等,热切地报道、评介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 1924 年国民党的改组打下了思想基础。本文拟以《星期评论》上的相关报道为中心,详细介绍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认知。

一、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的反应

十月革命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报道、议论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俄政权,成为一种热潮。

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处于在野地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管窥他们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新生政权的态度。

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人主办的报纸,我们先看一下该报的相关态度。

依据《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所载,1917 年 11 月到 1919 年 12 月底,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有关俄国革命的重要消息如下页表 1:

作者简介:杨宏雨,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星期评论》研究”(16BDJ052)的阶段性成果。

表 1 上海《民国日报》关于俄国问题的报道

出版日期	篇名	出版日期	篇名
1917. 11. 10	突如其来之俄国之政变	1918. 06. 07	协约国对俄方针决定
1917. 11. 11	俄国大政变之情形	1918. 09. 24	美国大使征求各国意见拟警告俄过激党 ⁽¹⁾
1917. 11. 13	俄国大政变之混乱	1919. 01. 04	红旗军消息
1917. 11. 13	十一日俄京电	1919. 01. 04	外交总长毕动氏演说消息
1917. 11. 20	俄国大局之混乱	1919. 01. 06	俄国过激党消息
1917. 12. 11	俄国停战中之内外情形	1919. 01. 12	莫斯科消息
1917. 12. 13	俄国过激派政府与德国停战消息	1919. 01. 18	过激主义消息
1918. 01. 01	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	1919. 01. 21	过激党妇女政策
1918. 01. 16	俄国内乱之蔓延	1919. 02. 13	俄过激派之面面观
1918. 01. 22	俄国国会消息	1919. 02. 22	劳兵会与莫斯科政府齟齬
1918. 01. 29	俄内乱又炽	1919. 04. 12— 1919. 05. 04	劳农政府治下之俄
1918. 03. 01	俄国求和时之内哄外患	1919. 04. 26	美国与列宁政府
1918. 03. 06	俄德和约已签字	1919. 06. 02	俄都实情目录录
1918. 04. 01	内田日使俄因谈	1919. 06. 30	俄局最近之真相
1918. 05. 27	俄国外交代表对外之表示	1919. 07. 07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 ⁽²⁾
1918. 05. 29	俄国数省发生粮食暴动消息	1919. 08. 26	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 ⁽³⁾
1918. 05. 30	俄国数省发生粮食暴动消息	1919. 10. 27	过激政府之新政策

1918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元旦社论《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其中涉及俄国的有三节:

俄国为吾之近邻,自今兹大战以来,外则受强敌之压迫,失地千里,其国民感受内外之忧患,乃奋起为大破坏大创造之事业,三百年君临俄国之罗马诺夫皇家,一朝为人民所颠覆,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

爱自由爱和平之俄国国民,其对于罗马诺夫皇家之革命与吾国辛亥义师同一意义也。然新政府之组织甫成,而外患内忧益加强度,里昂失陷,彼得城之危险更急,新政府颠覆,全国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其乱今未艾也。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所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尤较吾国为甚矣!

……

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

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权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4]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经常被一些研究者所引用的“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说的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

社论把俄国革命(未区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看作是争人权、争民权的革命,对十月革命后俄国陷于混乱状态表示忧虑,希望其能尽快结束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上海《民国日报》上的这篇社论,由孙洪伊撰写。孙洪伊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加入国民党,在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深受孙中山赏识。社论代表办刊者的立场。该文虽不是出自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人物之手,但也完全可以代表当时国民党人对俄国革命的态度。

虽然上海《民国日报》上有的报道也不可靠,如1919年2月13日发表的《俄过激派之面面观》,“纯系各种传闻的大杂烩”,^[5]但从总体上

看,该报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持同情态度。如在1917年12月10日的报道中说:“现下俄国内乱纯为阶级战争数百年酝酿之祸源,一旦迸发其势不可遏止。”^[6]1918年4月1日,该报借日使内田之口告诉国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政以后,“遇事果断,积极进行,大有非将政府积弊一扫而空不己之概。”^[7]1918年5月27日,该报简略地报道了俄国“表友善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引述俄国外交代表的话说:“俄人为拯救陷于束缚者之最良者。”^[8]1919年以后,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情、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言论更是比比皆是。“正视苏俄革命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存在的现实及其合理性,不回避乃至容忍以激进革命方式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的劳动者政权的可行性与发展趋势”,这是1919年以后上海《民国日报》,特别是其副刊《觉悟》报道苏俄问题的特点。^[9]

1918年3月,吴稚晖在上海创办《劳动》杂志,主要撰稿人为吴稚晖、李石曾、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大多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过同盟会,因此该刊也是管窥当时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态度的重要依据。

《劳动》虽仅出版五期,但对十月革命作了许多积极的宣传,先后刊登了《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李宁之解剖》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介绍了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称道列宁是“素来主张大同主义的最热心家”,^[10]并说“今俄国之所谓广义派主义 Bolshcrism,实即马格斯主义 Marxism(均产主义)”;^[11]高度肯定俄国革命的意义,“社会革命……是世界的自然趋势。”^[12]“法兰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13]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显地受到了劳人的《李宁之解剖》一文的影响。^[14]学者谈敏通过详细地阅读和研究,得出结论说:《劳动》杂志“广为搜罗外电报道中能够反映苏俄问题真相的资料,分门别类,汇集成篇,从施政要点、代表人物、党派机构、历史源

流等不同角度,描绘出一个与流行舆论不尽相同的苏俄图景,不少评介意见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让国人体悟列宁一派领导苏俄革命的新意和富有启迪之处”。^[15]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国民党人的态度。孙中山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和俄国革命家鲁塞尔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俄国二月革命成功以后,他立即致电俄国临时政府议会议长表示祝贺。孙中山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为世界之一大事件”。俄国革命成功后,俄罗斯得—“新共和国”,中国得—“佳邻”。^[16]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很快陷入内战,但这并没有动摇孙中山谋求倚重俄国推进中国革命的意向。1918年1月,他提出:“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7]1918年夏,孙中山给列宁和苏俄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8]显然,此时孙中山已经萌生了联俄革命的念头。^[19]1920年11月,他称赞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酿成一种良好风气”。1919年,他公开为苏俄辩护说,列宁领导的劳农政府,“组织完备,固为堂堂正正之政府”,既不是过激派,更不是无政府主义。^[20]

同一时期,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蒋介石等也对十月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胡汉民肯定十月革命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解释“已达到很高的水平”。^[21]朱执信称赞列宁是“吃苦辞甘的好人物”,^[22]苏俄红军“肯牺牲生命为主义而战”。^[23]蒋介石后来回忆说:“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24]

可见,从整体上看,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国民党人对俄国的革命和新政权抱着一种同情和肯定的态度。

二、《星期评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 评介概览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响应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报刊之一,该刊的三位主编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都是国民党人,署名作者共 52

人,其中“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人最多……占全部作者的 32.7% 以上”。“《星期评论》中,曾经参加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作者的文章至少有 332 篇,占总数(490 篇)的 67.7%。”^[25]因此,《星期评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认知,大体上可以代表五四时期国民党人的态度。

表 2 《星期评论》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文章

	作者	篇目	期号	出版日期	类别
1	季陶	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	第 3 号	1919 年 6 月 22 日	论述
2	季陶	日德俄联盟论	第 6 号	1919 年 7 月 13 日	论述
3	季陶	俄国民族的特性	第 10 号	1919 年 8 月 10 日	论述
4	季陶	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	第 15 号	1919 年 9 月 14 日	论述
5	先进	谢米诺夫与张作霖	第 16 号	1919 年 9 月 21 日	论述
6	季陶译	李宁的谈话	第 16 号	1919 年 9 月 21 日	翻译
7	季陶	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日本究竟怎么样?	第 17 号	1919 年 9 月 28 日	论述
8	季陶	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	第 26 号	1919 年 11 月 30 日	论述
9	季陶	美国西北利亚撤兵与日本	第 33 号	1920 年 1 月 18 日	论述
10	季陶	日俄边界是谁使他接近的?	第 33 号	1920 年 1 月 18 日	论述
11	先进	美国撤兵日本增兵	第 34 号第 1 张	1920 年 1 月 25 日	论述
12	季陶译、注	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	第 39 号第 1 张	1920 年 2 月 29 日	翻译,评述、注解
13		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翻译
14	季陶	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论述
15	仲九	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论述
16	颂西译	苏俄俄罗斯教育谈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翻译
17	汉俊译、注	强盗阶级(the Robber Caste)——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	第 46 号	1920 年 4 月 18 日	翻译,评述、注解
18		背信非义的日本军阀	第 47 号	1920 年 4 月 25 日	论述
19		俄罗斯苏域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解剖图解	第 48 号(劳动纪念号)第 10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翻译
20	颂西译	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	第 49 号	1920 年 5 月 9 日	翻译
21		极东的新帝国快要出现了!	第 49 号	1920 年 5 月 9 日	论述

表 2 是《星期评论》上集中讨论和介绍俄国问题的 21 篇文章。从内容上看,侧重讨论俄国革命原因的是《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俄国民族的特性》;侧重介绍、讨论苏俄对外政策的是《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侧重介绍、讨论苏俄内政状况的是《李宁的谈话》《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苏域俄罗斯教育谈》《强盗阶级(the Robber Caste)——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俄罗斯苏域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解剖图

解》《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其余文章的内容以介绍、评述列强对俄政策为主。

从作者(译者)来看,在这 21 篇文章中,戴季陶所作(译)的最多,占 11 篇;其次是李汉俊(署名汉俊和先进),为 3 篇;第三是颂西,为 2 篇译作。从上述比例可以看出,戴季陶在五四时期非常关注俄国革命,结合其他资料,可以得知,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宣传力度,超过被学界追捧的朱执信、廖仲恺等人。

戴季陶的文章占绝对多数,可能会导致一个

疑问:以《星期评论》为中心讨论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认知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解答:(1)戴季陶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9月被孙中山委任为随从秘书。孙中山去世以后,他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用儒家的仁爱学说阐发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强调“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26]并主张在国民革命中“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27]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阐发虽被讥为“戴季陶主义”,但从理论渊源上看,确实承接的是孙中山的相关思想,^[28]有些内容还获得过孙中山的认可。^[29](2)前文所列举的21篇文章是《星期评论》集中介绍、论述俄国革命和政权的文章,而不是该刊评述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全部文字。该刊或多或少涉及到的文章加起来多达60多篇,作者颇多,足以反映当时国民党群体的看法。(3)《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戴季陶的文章在其中占比虽多,但并不影响整个刊物的性质和功能。

三、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问题的重要性

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序言中写到:“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30]五四时期,戴季陶等人意识到,十月革命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事关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首先,从地缘关系来看,中俄两国有“一万余里”的国境线。^[31]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动”在俄国发生了,中国作为俄国的近邻,“姑无论其是非利害如何,那里可以不研究呢?”^[32]

其次,戴季陶等人指出,“现在的世界缩小了,关起门来做天下梦是不成功的了,要享太平一国是享不来的。”^[33]所以像十月革命这样的大事件,是一定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十月革命以

后,“世界的思想界,已经震荡到了极点,中国的思想界,迎着这个潮流,也就震荡起来。”^[34]消极地看,中国人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十月革命及其带动下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而应该未雨绸缪,把弊害降到最低;积极地看,俄国的革命和社会建设经验,可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所启迪。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我们尤其不能不切实研究。”^[35]

第三,“中国宜以俄为鉴……使革命频仍之痛苦消灭于无形。”^[36]许多人认为中国“工业幼稚”、阶级分化不明显,并且“大地主‘跋扈’也没有从前俄国那样利害”,^[37]所以不用研究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戴季陶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他们指出,正因为中国的工业“幼稚得很”,^[38]所以“劳动运动在中国是很幼稚的时代”。^[39]中国的劳工运动,“产业组织幼稚”——缺少工会组织,没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团体;“劳动阶级知识低级”^[40]——“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41]“大多数劳动者理解力和判断力都很薄弱”。^[42]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革命的思潮到了中国,“那里会有正确的‘布尔色维克’发生呢?”^[43]一旦有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44]必然是“国内乱事与外国的压迫同时并作”,整个社会走向“残杀暴虐”^[45]的境地。所以中国的社会精英对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这些正在欧美国家发生的大事变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应该努力“研究”,以便“指导社会”“指导群众”,^[46]让将来中国的发展“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47]

四、革命是从专制和不平里面涌现起的怒潮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从多方面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俄国革命是对专制政治和阶级压迫的反抗,

这是《星期评论》作者群的一个共识。沈玄庐说：“‘布尔塞维克’是从不平两个字里面涌现起的怒潮……从前的俄国，是个极专制的国，所以俄国便酿成了这个怒潮的起点。”^[48]戴季陶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恶制度恶习惯激动出来的”。^[49]孙中山也表示：“如果没有特别的压力，像俄国从前那样的政治，决不会有十分激烈的变态发生出来的。”^[50]

孙棣三和李汉俊讨论了引起俄国革命的其他两个原因。孙棣三说：“俄国革命，为了没面包吃而起。”^[51]李汉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波尔色维克的一派极端反对，他们不仅止于反对，他们还想乘机起革命，大从事于非战运动。”^[52]反对饥饿、要求生存，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这些都是直接引发俄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戴季陶还从人道主义传统这一角度讨论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他援引赫尔岑的话说：“俄国人思想的本质，在尼古拉帝治世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发达了。那时候运动的特色有三：一是悲壮的良心自由，二是激烈的否定，三是深酷的讽刺。”^[53]他认为中、美、俄三国都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仁’就是‘人’”，“中国人的道德观，以‘仁’为极致”，其实就是强调人道主义；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是“赞美歌”，是从“乐天的自己肯定”里面发生出来的；俄国的人道主义是“忏悔的祈祷”，是从“很深刻的自己否定”里面发生出来的。^[54]戴季陶分析俄国革命的渊源时说：“俄国的革命，人人都晓得是工人、农夫对资本家地主的革命，不晓得俄国那些革命思想的先觉，许多是极贵地位的贵族。克鲁泡特金是公爵，托尔斯泰是伯爵，他们为了多数人的自由，‘地位’‘财产’都抛了出来，去信奉那‘公众的所得应该公众享受’的道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俄国民族的特性了。”^[55]俄国革命是由俄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民族精神产生出来的伟大社会改造运动，这一提法在五四时期颇为流行。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把俄国十月革命看

作是“以人道、自由为基础”的革命，^[56]沈仲九也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以“发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人道运动”。^[57]

戴季陶还对专制压迫与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说俄国革命给俄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并产生了极悲惨的后果，推究起来，原因有三：

(1) 政府专事助长“阶级压迫”，使社会运动的进行不能健全发育。……

(2) 主张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人，不肯用渐进的忍耐工夫，专用反抗的手段，加增阶级压迫的程度。……

(3) 一般下级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下，没有接受合理的思想的能力。兼之种族、语言种种隔阂，社会运动更不能够发生普遍的效果。^[58]

在这三点原因中，戴季陶着力探讨了第一点。他说许多人都认为革命是新思想引起的，以为遏制了新思想，就能防止革命爆发，但却没有想过，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发生、传布的地点，偏偏在俄、德、奥、匈呢？何以英、美、法、瑞士那样的国家，今天还没有传染到呢？”这完全是因为俄、德等走的是专制、压迫之路，而英美等国行的是自由、民主之道。俄、德等国的统治者奉行“军国主义”和“阶级的专制”政策，以为可以通过暴力压伏革命思潮，“那里晓得‘布尔色维克’最怕的是平等幸福，最不怕的是专制。”^[59]从前俄国的检查官“禁止进口”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人文社科类书籍，但这并不能有效阻挡革命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这些学问，帮助俄国的革命思想不少。”^[60]这些足以说明，倘若不能消除引发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想靠思想专制来消灭革命是绝对不可能的。五四时期李大钊曾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61]戴季陶尖锐地指出，思想专制不仅不能消除革命，相反，它就是革命的温床。在言论无

法自由的情况下,“公然负责任的温和言论减少”,“秘密不负责任的激烈言论”大量增多,“秘密出版和秘密配布的手段也就利害到了不得”。这就是酿成俄国革命并形成目前这一“空前的大悲剧”的重要原因。^[62]

布尔什维克主义“生在专制窠里,长在专制窠里”,既是专制独裁的对立物,同时又是它的伴生物。所以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的最好的方法不是钳制舆论、控制思想,而是建立一个“平和的国家”“互助的社会”。如果中国能够“除去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压力、不合理的组织,使‘中华民国’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人人都有很安全很正当很自由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得到极巩固的生活保障”,^[63]那么就无须担心什么布尔什维克或过激派了。否则,类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风潮是挡不住的。

五、十月革命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新趋向”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列宁等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也是戴季陶等人在《星期评论》上探究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得出的结论。

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说:“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64]李大钊的这一论述,突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典范的法兰西革命的差别:一为世界主义的革命,一为国家主义的革命;一为社会的革命,一为政治的革命。五四时期,戴季陶等人对俄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基本上达到了李大钊的认知程度。

戴季陶首先从词源上对“布尔什维克”作了解释和辨析。布尔什维克一词,“照俄国话的原文翻译出来就是‘多数派’的意思……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党在英国伦敦地方开了一次大会,列

宁的一派和布列哈诺夫(即普列汉诺夫——引者)的一派,因为政策不同,彼此争论起来,结果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于是大家就叫列宁派做‘布尔色维克’,叫布列哈诺夫一派做‘免色维克’(Menshevik)。”中国的报刊上大多把布尔什维克称为“过激派”,不少人一听到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这些词就想到了“过激”二字。其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和过激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称为“过激派”的首先是日本,“是日本那些因为怕‘布尔色维克’便生了‘胆怯病’的人制造出来的。”“中国也有害‘胆怯病’的人,也跟了用‘过激’两个字……其实俄国人并没有自己叫‘过激党’,英、法、美、意、德、奥和一切欧美各国都没有叫它做‘过激党’的。”^[65]

在《星期评论》上,沈仲九认为十月革命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新趋向”,这一革命就宗旨而言,是“发挥人道主义”的人道运动;就方针而言,是“改造社会”的社会运动;就范围而言,是要把运动“普遍到全世界”的世界运动;就目的而言,是“要推翻强盗阶级,使全世界人民,都变为劳动者”;就方法而言,是“对于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旧学说”进行“大破坏”,同时对“国家、法律、政府、宗教、家族、婚姻等等”进行“从新组织”。^[66]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31号说:“俄国的劳农政府,他们公然‘标榜共产主义’,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仍旧是‘集产主义’;仍旧是‘国家的’并不是‘非国家的’。”^[67]在该刊第47号说,俄国革命是“社会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下面的革命”。^[68]从表面上来看,这两次的说法是矛盾的,但实际表达内容是一致的。戴季陶的意思是,俄国革命从趋向和目标上看,是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阶级、一切私有制度的共产革命,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实现了俄国国家范围内的变革。俄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集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国家只把主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没有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社会主义是苏俄的基本特征和基

本性质,在戴季陶译、注的《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中,先后使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的政府”“社会主义政府”等概念;在周颂西翻译的《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中,也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一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泰斗。1918年12月,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写道:“俄国 Bolsheviki……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69]五四时期,戴季陶等人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沈玄庐认为俄国革命是因为马克思“播下了革命种子”,这些种子“遇到机会”,“像春园的笋裂开土层冲了出来”。^[70]戴季陶说布尔什维克是“一种信奉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党派”。^[71]他们的社会改造方略与同属社会主义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相去不可以道里计。”^[72]“‘苏域’(Soviet)的组织”是俄国的“多数派(Bolshevism)”把“马克斯的教义”与俄国的历史和现代境遇相结合的结果。^[73]

五四时期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都讨论过十月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影响。“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之绝大变动。”(李大钊)^[74]“这回俄罗斯革命,总算是二十世纪一桩大事。”(王光祈)^[75]“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76]俄罗斯革命为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第三度改革之试验,自不能不有大牺牲”,但“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傅斯年)^[77]

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在《星期评论》中对俄国革命意义的讨论也十分精彩。沈仲九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新趋向”。^[78]戴季陶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主义”的革命,^[79]它宣告了“以占领原料地和消费地为目的之军国主义”和“以垄断购买贩卖市场为目的之经济的帝国主义”

的破产,^[80]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动”。^[81]他把俄国二月革命“推倒罗马诺夫王家”,十月革命后俄、德“单独媾和”,俄国率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82]沈玄庐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看作是20世纪初年世界的“三个大变动”。这三个大变动,表面虽不同,却都是“旧的崩坏和新的建设”。在这三个大变动的影响下,“世界是人的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这一呼声,“越喊越高,越做越像。”^[83]

六、苏俄对华宣言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

十月革命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大转折。1917年11月8日,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立即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法令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理念:“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84]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和平法令》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废除秘密条约”“在交战国双方军队的工农之间组织最广泛的联欢”“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民族)政策彻底决裂”等主张。^[85]1918年7月,《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基本内容被写进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苏俄的对外政策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赞赏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介绍和讨论了苏俄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国人普遍关心的对华政策。

戴季陶指出,俄国在二月革命以后,就已抛弃了“彼得帝以来的侵略政策”。^[86]十月革命以后,“劳农政府在他的主义上,不承认罗马诺夫王朝所侵略的权利,这是宪法上载明的。”^[87]不论

俄国的劳农政府是不是“毒蛇猛兽”，“我们单就他‘不侵略’的这一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宽容他，认为他是无恶意的。”^[88]

十月革命以后，原俄罗斯帝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发动叛乱，一度在鄂木斯克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支持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权，并派兵加入协约国对俄国革命进行干涉。对此，戴季陶评论说，“我们就中国国家的利益及亚洲的和平幸福上着想，我们所要亲善的，是平和的俄国，是民主的俄国，不是侵略的俄国，不是帝国的俄国。”^[89]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不但“没有要侵略中国”，而且主张放弃庚子赔款，取消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取得的一切权利。^[90]与此相对照的是，鄂木斯克政府公然阻止中国兵舰依据条约合法地享有“在黑龙江的溯江权”，“为外蒙取消自治问题，对中国提出严重的抗议”……这表明，在鄂木斯克的“苛尔恰克政府……不但丝毫不抛弃前朝的侵略政策，而且他的态度，比从前的俄政府还要强硬，还要恶劣”。^[91]因此，中国决不应该交恶莫斯科而交好鄂木斯克。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后，全力在欧洲推进革命。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最后一段，向英、法、德三国工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92]1917年12月15日，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发表《告欧洲被压迫和疲惫的人民》呼吁书，号召工人和士兵“从资产阶级罪恶的手中，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权夺过来”。^[93]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把革命从俄国推向世界的企图仅仅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引发了一些罢工和革命骚动，不但没有燃起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相反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协约国十多个国家从东西两面联合干涉苏俄内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苏俄政府把全力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联合围剿的战略。在远东和中国结盟，牵制和削弱日本，避免两线作

战，成为苏俄的不二选择。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弃庚子赔款，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获得的领土，放弃俄国从前在中国所获取的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各种特权，号召中俄人民联合起来，为自由而战。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反应，人们盛赞宣言“开历史之纪元，立和平之基础”，“为世界外交史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94]在1923年12月北大建校25周年举办的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民意测验中，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得票227张，居第一，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居第二，但其得票数不到列宁的四分之一，仅51张。此外，在这次民意测验中，有497人认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仅107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朋友。周月峰指出：宣言“直接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美俄易位，……从而在中国出现了‘列宁时刻’，‘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95]

1920年4月11日，《星期评论》第45号以《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为题，全文刊登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在同一号上刊登了戴季陶的《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和沈仲九的《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两篇讨论文章。

1919年9月，戴季陶从日本的《每日新闻》上获知苏俄发表了一个对华问题的通告，“声明劳农政府取消一切秘密条约，并且撤回义和团事件的赔款。”^[96]当时他虽然不知道宣言的全部内容，但却明显地左倾起来，先后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李宁的谈话》《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日本究竟怎么样？》《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等一系列带有“亲俄”色彩的文章。获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全部内容后，戴季陶称赞宣言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中

国人民对于苏俄这一宣言,不仅“应该十分感谢”,而且“更应该要觉悟”,站起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97]两周以后,戴季陶提出了他关于远东问题的三项主张:“声援为免除国家的掠夺而战的朝鲜平民反抗日本国家的革命行动”;“合全国平民,取任何手段,声援受日本掠夺的西伯利亚平民”;“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取任何手段,对于日本国家及其资本家的生产制,加以打击,同时促起日本平民之世界的、阶级的觉悟。”^[98]可见,苏俄对华宣言已经成功地俘获了戴季陶这位三民主义信徒。

沈仲九在《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中指出,“我国自从和欧美各国有外交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的,几乎没有一次不丧失权利的。”此次居然不用费口舌之力就能获得土地和权利的归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要借归还权利这件事,来表现他们的宪法精神”。“他们宪法的精神,是要剥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应该要赞同俄国宪法的精神,不能仅仅赞同归还权利这一端”,“要晓得我们所赞同的利益,是从人道正义下面得来的利益”。在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和人道、正义、真理联系在一起之后,沈仲九指出:“人道正义的提倡,是人类共通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协同各国的劳动阶级,为自由而奋斗”。^[99]

1919年6月15日,《星期评论》第2号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100],提出了国民党人的两项外交纲领:“(一)废除并修改一切不合自由平等互助精神的条约。撤废外国及外国人在中国所有的一切特权。要求中国及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平等待遇,开放全国于世界。(二)废除秘密外交。凡一切国际交涉,悉为公开。‘缔约’、‘宣战’、‘讲和’的权力,属于国会。”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张,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和要求,而且刚好契合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外交主张,因此引起了戴季陶等人

热烈的响应。无论是戴季陶还是沈仲九,都注意到了宣言里中俄联合、共同为自由而战的呼吁,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这又为此后国民党的联俄联共、进行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七、苏俄治下有着“充实的社会民主的精神”

十月革命以后,列强除了封锁、干涉俄国革命外,还竭力抹黑俄国政权,导致“浮说”盛行,不少人“以为俄国行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101]戴季陶等人在《星期评论》上把他们获知的一些比较有利于苏俄政权的消息和资料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并加以适当的点评。《星期评论》上关于苏俄形势和内政的评介文章,主要有《李宁的谈话》《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苏域俄罗斯教育谈》《强盗阶级(the Robber Caste)——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和《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

戴季陶译、注的《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是《星期评论》上对苏俄情况介绍得最丰富、最翔实的一篇。

戴季陶首先论述了信息来源的可信性。该材料为“美国前陆军情报局长、讲和委员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氏在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布氏是美国陆军情报局长,又是讲和委员的一人。去年二月末,受兰辛及好司大佐等的委托,和其他同僚赴俄调查实状。”这段介绍传达了以下信息:(1)布里特是美国人,不是俄国人,更不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不存在偏袒苏俄的情况;(2)布里特是前美国陆军情报局长,受过专业训练,不容易受欺骗;(3)“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布里特在1919年2月亲赴俄国实地考察过,掌握第一手的材料;(4)该材料是布里特在美国上议院的报告,有着政治严肃性,不存在故意制造噱头、夸大其词等做法。

就经济而言,布里特指出,在协约国集团的封锁与高尔察克等叛军的攻击下,“现在俄国的经济状态,陷于极困难的境遇”。俄国“除军需品制造以外,大部分的工业,多停止了……国民中

人物及劳力的精锐,都为军事使用”。但是另一方面,“劳农政府(Soviet Government)把经济生活之一切要素,尽其力能至,利用到最大限度。现在运输中的列车,都照着预定的时间很正确的运转。粮食的分配,也管理得很巧妙。”

从布里特的报告了解到俄国的情况之后,戴季陶评述道,过去“从欧洲、美洲、日本往往传出消息,说劳农俄国人民怎样困苦,而政府里面的人如李宁、脱罗茨基,怎样奢侈”,这其实是“讹传”,事实是俄国劳农政府治下有着“充实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政府的领导人都和普通的士兵工人一样,“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就是靠“均”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就政治而言,布里特认为苏俄政权“确也有恶用权力和专制的弊害”,但同时指出“就今天俄国的情形说来,实在很与要求适合”。目前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组织的劳农政府不仅没有崩溃的迹象,而且它的地位“极其巩固”。“劳农政府Soviet好像是俄国人民革命的‘象征物’。”“国民虽是濒于饥饿,仍旧一般的援助这个政府。这是俄国今天最显著的一个事实。”“一般人民,大家都把他们受困苦的责任,归到‘封锁’和‘行封锁政策的外国诸政府’。”

在社会方面,布里特介绍说,俄国革命时代和恐怖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政府的努力,完全向着建设方面。”“反革命镇压临时委员会”(即“契卡”)仅有“告发反动革命运动者”的权力,没有审判权,审判权仍属“正式的裁判所”。死刑极少,秩序井然,“街市上也极安全”。旧时代的“丑业妇”——“卖淫的女子”,“连影子都不见一个了。”过去外界盛传苏俄共产共妻,但实际上“家族生活,绝没有因为革命受一点变化”。不仅如此,旧时代妇女受侮辱的情况不存在了,“对于妇人的尊敬,再没有比俄国今天这样尊敬的。”

戴季陶感慨地指出,布里特在报告中所说的“丑业妇的影子都不见了。因为使这个职业存在之经济的理由,完全消灭了”。“这几句话,实在

是废娼运动的基本概念。”“我以为娼妓卖淫的这一种制度,是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现行经济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现象……倘若不从根本上把经济组织改造,娼妓这一种罪恶无论如何是免不去的。”

在教育方面,布里特介绍说,教育部的工作“功绩实在大极了”。他们把俄国各种古籍,“都翻印了三百万乃至五百万部。以极廉的价,分配于民间”;又在全国各地增设了几千个新学校。苏俄教育专家认为“天才与狂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为“有缺陷的儿童及神经过敏的儿童”设置了专门的学校,教授他们音乐、绘画、雕刻、作诗等。政府在旧日的许多宫殿里为劳动者和士兵设置了俱乐部,在那里通过“电影及讲演”来教导民众,又在美术馆里为男女劳动者“特设教绘画的学校”。

戴季陶评述说:俄国劳农政府本着“现在的人可以吃苦,但是决不使将来为社会努力的人吃苦”的理念,“尊重教育事业”“优待受教育的学生”,他们为“促进文化”的发展竭尽全力,与只知“蹂躏教育”“用军警的威力压迫学生”的北京政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布里特的报告还介绍了苏俄的军队和士气。俄国现在前线作战的军队,“有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他们差不多都是十七岁至二十七岁的青年。”军队中大部分士兵是共产主义信奉者,他们作战勇敢,常常“以十字军东征的热诚来打仗”。帝俄时代的军官,“在新军队的军事行政上面,占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们权力的行使,受到“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的监督和制约。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士兵的精神风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过去那种“在皇帝下面的那种丧家狗的样子”荡然无存,现在他们“很像一个自由民”,“国民对于他们的评判也很好。”^[102]

《李宁的谈话》是列宁和挪威政治家奔特福尔德民的一次谈话。在交谈中,列宁对俄国当时的形势与政策作了介绍。原文刊登在挪威的《诺格伯拉特报》,1919年9月7日,日本《大阪每日

新闻》译载了这个谈话。戴季陶读到后,从日文翻译成汉文,刊登在《星期评论》第16号上。

在这个谈话中,列宁承认俄国的经济形势很严峻,“乡间没有原料,都市上没有食料”,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下面”。

列宁指出,在俄国“半农”(即雇农)“是布尔色维克最有力量的同志”。他们赞成土地国有政策,“现在仍旧和从前一样,专靠卖劳力吃饭”。小农(即富农)和大农(即地主)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采取敌视的态度。“‘小农’因为布尔色维克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大农”则是因为劳农政府实行“粮食专卖”,导致他们无法“自由贩卖”他的生产产品。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有一切经营新闻的资本,有印刷的机器”,而劳动者一无所有,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所谓的言论自由,“只不过是欺骗劳动者的一种资本家的权利”,其实质就是“资本自由”。对外界攻击劳农政府管制新闻和言论的说法,列宁回应说,这是战时的一种特殊做法,“等我们对于资本阶级的战斗完结,立刻就要做回复言论自由的功夫。”事实上,即使处在战争状态下,布尔什维克政府也给了其他社会力量的代表者一定的言论自由,如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仍在出版。“倘若各党能够表示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意思,我们便立刻可以撤废对于反对党机关报的‘拊口令’。”对那些动不动攻击劳农政府专制的人,列宁建议他们到高尔察克统治下的西伯利亚去看看,对比一下,就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善良的”。^[103]

《星期评论》第49号刊登了周颂西译自 *The Eye Opener* 上所载的《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文中称赞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像别的政党一样,在要想多得票数的时候,只不过去传布他们的主义,他们是预备去实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把土地交给农人”,接着“向全世界请愿和平,并且向德国和中央诸强国(指一战中参加同盟国的奥匈帝

国等中欧国家——引者)提议非正式的会议”,接着“在一个月里头又通过了银行收归国有的命令”。布尔什维克党非常重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权利和幸福,“德漠克拉西可以算世界上发达至极点了。”在苏俄,“一切政治的权柄都归了工人农人的手里去了。”“大家必须做工,并且大家享受做工的结果和尊严。”这是一种“真正的德漠克拉西”,不是“假德漠克拉西”。^[104]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积极推动俄国境内的民族自决与自治运动。“苏域俄罗斯对于俄罗斯帝国从前受治种族的政策是光明。”它“承认受治人民的权利”,允许“从前的帝国境内各种族的自治和自决”。因为实行了以允许民族自治和自决为中心的正确的民族政策,“那苏域政府已经完全承认从前俄罗斯帝国里的某国的自治权。那些和他相关的国度却效法了俄罗斯苏域政府,也立了苏域政府并且和他已经公开的联盟了。”^[105]

《星期评论》还借萧伯纳的话反驳了布尔什维克虐待战俘的说法,“他们待俘虏很仁爱亲切,并且给许多小本头的书给他们,使他们确实明白波尔色维克作的什么事……他们教育成了年的俘虏,与他们教育俄国的儿童是一样的。”^[106]

到1920年上半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已经执政了2年多了。这两年多的形势是一方面有内忧外患,另一方面革命政权在内忧外患中逐渐巩固。戴季陶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并特别强调后一方面。“从前年十一月六日劳农政府成立以来通看,他的地位,反和世上的诅咒相反,一步一步,向稳固一方面进。”^[107]“现在俄国过激派的势力日甚,民心已离却旧官僚政治,可无疑义。”^[108]戴季陶引述美国前陆军情报局长布里特的话,非常肯定地说:“要想于社会主义的政府以外,建设任何政府,除了靠外国炮火的力量,在今天的俄国,是决做不到的。而且这样建设起来的政府,一旦失了外国武力的援助,立刻就要倒灭下来。”^[109]

颂西所译的《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

新纪元两年的故事》一文说,苏俄政权成立之初,“最大度的人也不过料他能够经过俄国的冬季的一部分罢了”,但现在革命政权不仅有了它两周年的纪念,而且“很胜利的进了他生存的第三年”,这实在可喜可贺。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相比,苏维埃政权的寿命“已经不止十倍的长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幼婴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抵抗那从国外压迫过来的战争的风潮,和那奸恶残忍的封锁”,生存了两年多,并将继续生存下去,这足以说明它不是“一个很侥幸很切望的成功”,而是“酿成他的事实和境遇里头固有的和不能免的老及克(意为“逻辑”,是英文 logic 的汉译——引者)的一种表现”。^[110]

“虽然那苏域官吏对于行政的成就上有所矜夸”,但他们“为了未来共生的生产已经建设了一个健全的基础”。^[111]周颂西译自 *The Eye Opener* 的这两句话,大致可以代表《星期评论》对苏俄内政建设的基本看法。

八、结 论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星期评论》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的评介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正义性。帝俄政府推行专制,“专事助长‘阶级压迫’,使社会运动的进行不能健全发育”,^[112]导致了二月革命的发生。二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了中等社会的分子”,对人民所关心的“那土地与和平的大问题”,一样也无法解决。这才导致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执政。^[113]

2. 正确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质,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动”。^[114]它的领导者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信奉的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115]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有着天壤之别。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俄国推行的是“集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稳和的社会主义”。^[116]

3. 高度赞颂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以放弃帝俄在华获得的各种权益为中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称赞该宣言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117]主张中俄两国人民联合起来,“为自由而奋斗”。^[118]

4. 褒扬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两年多的统治,肯定其推行的各种社会变革及其成效,为将来的理想社会“建设了一个健全的基础”。^[119]

不难看出,《星期评论》上以戴季陶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及苏俄政权持同情和肯定态度。

十月革命以后,在协约国集团的封锁下,外部世界很难得到俄国的真实情况,戴季陶等人通过自己的辨证与分析,在《星期评论》上用比较可靠的材料向读者传递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政外交的正面状况。这些评介,虽然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带有预防社会革命在中国爆发的意味,但总体上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中国民众认同和接纳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俄政权,而这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星期评论》被誉为“共产党的细胞”,^[120]戴季陶则因在五四时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瞿秋白将其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并提,称其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21]李立三更肯定地把戴季陶和陈独秀、沈玄庐等并称为“中共最早的发起者”。^[122]

十月革命的成功,让孙中山既震惊又振奋。他惊诧于俄国革命起步晚而成效大,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样板而兴奋。“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23]孙中山曾是一个防俄论者,^[124]苏俄宣布放弃帝俄时代用掠夺手段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后,他盛赞苏俄“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125]“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126]他明确提出了联俄的主张:“俄国与中国,今为对等之国家。彼对于不平等条约,有共同之目的,诚为中国之友邦,其援助中国也,

乃当然之事。中国之与提携也,亦不能不谓当然。”^[127]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改组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进行的,是莫斯科东方战略的一部分,师俄、联俄以推进中国革命是这次改组的重头戏。杭州西湖会议、《孙文、越飞宣言》、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及其宣言,无一不闪现着俄国人的影子。而孙中山和大批国民党人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则是国民党这次自我革命,走向新生的思想基础。

注释:

- [1] 题目为笔者自编。
 [2][3] 载于该报当日副刊《觉悟》。
 [4] 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5][9] 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中),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8页。
 [6][7][8] 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35、56页。
 [10][12] 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列宁事略》,《劳动》第1卷第2号,1918年4月20日。
 [11][13] 劳人:《李宁之解剖》,《劳动》第1卷第3号,1918年5月。
 [14] 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许纪霖编选:《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1页。
 [15] 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16]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页。
 [17] 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0页。
 [18] 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0页。
 [19] 孙中山:《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0页。
 [20] 孙中山:《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7页。
 [21] 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 [22] 朱执信:《改革者的两重义务》,《朱执信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82页。
 [23] 朱执信:《兵的改造与其心理》,《朱执信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8页。
 [24]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9页。
 [25] 杨宏雨:《〈星期评论〉作者群研究》,《理论学刊》2018年第3期。
 [26]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0页。
 [2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6页。
 [28] 滕峰丽:《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1909-1928 戴季陶思想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128页。
 [29]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33页。
 [30][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序》,《震撼世界的十天》,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1][32][81][88][89][91][107][114]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33] 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
 [34] 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35][39][42] 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4张,1920年5月1日。
 [36] 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1页。
 [37][43][49][59][63][65]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38] 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40][80] 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3张,1920年5月1日。
 [41] 季陶:《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44][46][50] 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45][47] 季陶:《工人教育问题》,《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48] 玄庐:《“人”与“物”》,《星期评论》第12号,1919年8月24日。
 [51] 椽三:《规复漕运与粮食骚乱》,《星期评论》第6号,

1919年7月13日。

[52] 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下)》,《星期评论》第53号,1920年6月6日。

[53] 季陶:《束缚思想自由的且看》,《星期评论》第16号,1919年9月21日。

[54] 季陶:《人道主义》,《星期评论》第8号,1919年7月27日。

[55] 季陶:《俄国民族的特性》,《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56][64][74]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226、225页。

[57][66][78]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与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58][112] 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60][62]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61]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6页。

[67] 引文来自1920年1月3日《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2张季陶译、注的《马克思传》(威廉·里布列希著)注四。

[68][79][98] 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69]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260页。

[70] 玄庐:《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71]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72][87][101][102][109][115]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第1张,1920年2月29日。

[73] 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75] 王光祈:《俄罗斯之研究》,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第4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8页。

[76]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77] 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创刊号,1919年1月1日。

[82] 季陶:《国际联盟与世界和平》,《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83]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84][92] 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1、11页。

[85]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855页。

[86][90][96] 季陶:《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

[93][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94] 《中国各群众团体和舆论界对于苏联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77、379页。

[95] 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97][117]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99][118] 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100] 吕芳上认为《星期评论》第2号《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实际上都合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主张,或者说中山先生最后三民主义的阐释,隐约采取了这一主张的若干论点。”参阅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54-55页。

[103] 季陶译:《李宁的谈话》,《星期评论》第16号,1919年9月21日。

[104][105][110][111][113][119] 颂西译:《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星期评论》第49号,1920年5月9日。

[106] 汉俊译、注:《强盗阶级(the Robber Caste)——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108] 先进:《美国撤兵日本增兵》,《星期评论》第34号第1张,1920年1月25日。

[116] 季陶:《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日本究竟怎么样?》,《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120] 《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121]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页。

[122] 参阅李立三:《党史报告》,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09页。

[123]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页。

[124] 参阅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99页。

[125][12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225页。

[127] 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1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